

现代国际关系论丛

(第一辑)

《论丛》编辑委员会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国际关系论丛(第一辑)/《论丛》编辑委员会.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1. 12

ISBN 7-80009-685-8

I. 现… II. 郑… III. 国际关系—文集
IV. D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494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时事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字数: 363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序

陆忠伟

当前，国际形势与周边安全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虽然国际和平大局可以维持，但领土争端、民族矛盾、宗教纠纷等因素引发的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不断。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现代化建设，将在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很不太平。”对形势严峻的一面，我们一定要清醒的认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不愿看到任何地区在发生热战、冷战和动乱，都不愿看到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在推行新的霸权和强权，都不愿看到南北之间的发展差距、贫富鸿沟再扩大下去”。

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是在隆隆炮火中发展变化的：1997—1998年发生在东亚的金融战争、南亚核爆炸危机等事件，使这两年成为“动荡年”；1999年则因科索沃战争、朝韩黄海海战、印巴卡吉尔冲突成为“冲突年”；2000年因朝韩峰会、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中非论坛而成为“造势年”；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10·7”反恐战争反映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存在着深刻矛盾。国际恐怖活动的爆发或表面化，实质上与现代国际关系中主要矛盾的转换有关。换言之，东西对抗、军备竞赛、两超争霸、战争危机的局势有所缓和；南北差距、民族矛盾、宗教分歧、资源享有及全球化负面影响等诸多问题一举激化，形成国际争端的热点、焦点、难点而不可收拾，以至全球安全态势图上，出现了一条恐怖活动高发地带。安而不

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对恐怖主义这个全球公害给国际社会稳定带来的威胁，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随着人类进入 21 世纪，世界各大力量都有一种紧迫感、危机感。因为在新世纪综合国力超级棋盘上的布局、造势，关系到今后一百年国运之盛衰，是一个与“球籍”、生存相关的大事。作为当代发达国家的美、欧、日，为保持既得利益与国力优势，积极谋划新世纪的安全战略、外交战略、发展战略，欲继续在世界民族之林扮演第一提琴手；当代国际力量格局中另一重要战略方阵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加紧谋划和完善新世纪的发展构想和战略，从而使世纪初叶的综合国力竞争呈现白热化状态。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从各国的发展思路和构想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国际大竞争的压力和机遇，更深刻地体会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发展是硬道理”的道理所在。

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出现不少重要变化和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崛起的外部环境逐渐在向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其标志可以概括为三句话：（1）国际战略格局从美苏争霸的“两家人”变为大国互相依存的“多家村”；（2）各大力量对比从美国独秀的“高峰型”变为龙腾虎跃的“高原型”；（3）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从美国拍板定调的“一言堂”变为各有主张的“群言堂”。这三大变化说明，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已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现实战略问题，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加速发展。

进一步讲，多极化格局在综合国力对比上表现为“一超多强”的特征。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各算一强；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战略单位计算的话也可算是一强。这种一超与多强的国际格局有如下战略含义：首先，美国是矛盾的焦点，是主要的碰撞面，是各强的重要周旋对象。其次，超与强、强与强之间，矛盾交错，利益重叠；外交上的纵横合

纵，远交近和、斗而不破，既较量也商量成为大国关系的主旋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美日关系的磕磕碰碰，中日关系的停停走走，中俄关系的虚虚实实都是这一大战略格局的投影。

多极化进程的加速，带来了大国关系的变动，使之具有明显的复杂性、重叠性、模糊性、多面性、建设性。大国关系的“性感”，既显示了关系的成熟，又拓宽了各国对外周旋的半径，同时也增加了外交政策的难度，形势迫使各国首脑施展外交大手笔：高层外交、议会外交、民间外交、经济外交、体育外交、学者外交、文化外交，尽量使本国适应“多极化”这一国际格局新面孔，使外交战略更具两面性及全天候反应能力。如美国的“两洋战略”，从大战略高度重视对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大地区的经营。俄罗斯的“双头鹰”战略，既盯住欧洲，也着眼亚太地区。日本的“欧亚大陆外交构想”，更是一个以美、中、俄三国为目标的多元大外交。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呼唤各国酝酿立体的外交战略思考，并为此提供更高质的战略情报。

在我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营造，需要我们从更高或更深的视野来研究、考虑这一问题。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因国际安全大气候的变化而再次演绎。“9·11事件”之前，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演绎的主要影响有两点：虚构的“中国威胁论”及与此相关的、虚虚实实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论”。

“9·11”事件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都出现了重新划线的问题。美国在推动其“全球反恐联盟”中，通过双边协调与多边穿梭，落实其安全战略思想。中美关系在战略或安全领域，共同利益、直接联系增加了，这是个积极因素。美国总统布什于2001年10月18日抵上海参加APEC峰会，即反映出未来亚太局势的新方向。布什的上海之行传递出如下政策信

息：美国的安全关注焦点从海洋亚洲转移到内陆亚洲。

从军事战略角度看，“9·11”恐怖袭击一下子把冷战以来美国相对轻视的“本土防御”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美国战略决策层，在外交与军事资源相对有限的前提下，必须重新估量“攻势”与“守势”之间的资源分配；同时，亦需调整“前沿展开”和“本土防御”的战略比重。作为应急措施，美国将在资源配置上，向反恐怖或相关的本土安全领域作“倾斜投入”。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它导致各大国调整安全与外交日程，引发了大国关系的变动，各主要国家安全观的变化、新对外政策思想的提炼及新的战略谋划，进而催化了区域安全态势甚至国际关系的演变。即从冷战时代——冷战后时代进入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的时代。战争的进展促进了大国高层会晤的空前活跃，国家关系的重新洗牌，外交成果的积淀，及相关规则的确立，孕育着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出现。

从地缘战略角度看，恐怖活动的重灾区主要是中亚、南亚、中东与东南亚的部分国家。这一地带又是经典陆权理论所描述的欧亚板块的结合部。阿富汗战争的打响，使人想起了在核时代一度被遗忘的地缘政治学说。不言而喻，国际反恐联盟成员国具有不同的地缘战略或地缘经济利益，以及极其自然的防御本能的反应。如果反恐战争被解释为一种地缘战略行为，势必将加速地缘政治新棋局的形成。

从国际秩序角度看，国际恐怖活动的猖獗，震动了各国高层。而恐怖活动与经济衰退互为影响，以及国际恐怖活动手段向NBC（核生化武器）的升级，使国际战略态势酝酿着重大调整。危机变为契机、契机变为转机。“9·11”事件后的大国外交表明，反恐怖、反萧条、反贫困已成为新世纪国家安全工程的重要任务，国际关系调整的重要内容，以及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国之间就战略与安全问题的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在增大。可

以说，上述“三反工作”对国际新秩序的形成起着催生的作用。在此形势之下，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不少国家重新思考和权衡本土安全与军事、政治安全的相互关系，大大提升本土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采取一系列手段来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这势必导致美国及各大力量对外战略目标优先顺序与外交政策的再思考与重大调整，并据此提出现代“大安全”政策的任务。

中国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客观上逐渐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与国际经济前沿；综合国力的迅猛发展，使之举手投足，对国际力量平衡及周边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国际安全或经济领域的重大突发事件又使中国建立并完善外交决策机制或国家安全快速反应机制的必要性突出出来：1997年来势凶猛的亚洲金融风暴、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及同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牵动国际战略格局与地缘战略态势变动等等。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使中国在集中精力应对眼前问题的同时，必须重视对发展大势的战略把握，以产生真正的大战略、大思路。

此书是三方合作的成果，编辑此书的目的在于从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安全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从不同的方面来分析我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因为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是紧密相联的，中华民族的崛起，与世界巨变或战略格局的转折时代相伴随。实行正确的国家战略，国力就会增强，国际地位就会上升。

可以说，对国际大局和国际环境的估量，深刻地影响党的各项事业。此书有助于读者登高望远，了解某种程度的国际战略规律、国际形势的阴晴变化，以及我国在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认真思考和研究一些大的问题，真正做到知彼保己，使自己操练的高人一着，更好地为我党的基本路线和总战略服务。

2001年12月京西万寿寺

前 言

《现代国际关系论丛》（第一辑）收录了《现代国际关系》等杂志近一年多来有关现代国际关系的论文 30 篇和《现代国际关系》杂志编辑部于 2001 年 5 月 25 日邀请京津地区部分国际问题专家举行的中美关系座谈会发言摘要。

全书分为三编。

第一编为总论。所录大都是从全局着眼，比较全面地探讨当代国际关系的论文。当然，各家侧重不同，有的注重对现实国际关系的分析，并提出对策，有的则更注重对国际问题的理论性探讨。

第二编分别论述了国际经济、国际军事、全球化、信息技术、有组织犯罪问题、世界邪教问题、“人权”问题、“人道主义干预”问题、地下经济发展态势问题、民族问题和“人才安全”等诸多问题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第三编所录论文以中美关系及美国问题为主，涉及冷战后中美双边与地区战略安全问题、全球化与美国的战略、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传统、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文化战略问题等等。此外，还有关于研究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论文五篇。

（一）

《大竞争呼唤大战略》是本书收录的第一篇。该文开宗明义

指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将为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大竞争提供新平台；“发展大竞争”很可能成为 21 世纪初期的时代主旋律；全球各主要力量均已瞄准未来 5—10 年，设法为 21 世纪综合国力竞争抢先手。由此出发提出了“各国聚焦发展，综合国力竞争白热化”这一平实而贴近客观事实的论点。随后又提醒人们注意：虽然国际战略格局总体稳定，但是多极化进程更趋复杂化，尚存在着美国坚持视中国为潜在战略对手，使两国关系摩擦增多，以至于有走向对抗的危险，但同时指出，由于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差距大、经济具有互补性，因此也存在着通过战略对话、增信释疑，使中美矛盾与摩擦具有可控性，相互矛盾不脱离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基本形态。世界经济进入新增长期，东亚成为全球性产业转移的主要落脚点，未来 5—10 年，发展大竞争势必推动美、欧日在东亚展开新的角逐。在发展大竞争的背景下，军事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到各国的高度关切，国际军事安全环境将经历更深刻的变动，从而使各国军备扩张势头加快，军事安全领域存在严重隐忧。由于地区力量结构相对稳定，中、美、日、俄、印和东盟六大力量无一能在我国周边地区内取得支配地位，因此区内基本格局不致于失衡；地区热点和潜在热点仍具有相当大的可控性，如朝鲜半岛局势趋缓已不易逆转，印、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下降，阿富汗内战和解空间增大，印尼民族、宗教冲突短期内不致于引起国家分裂；地区多边合作势头强劲；由是观之，中国周边环境总体稳定，睦邻外交任重道远。文章不长，却言简意赅、提纲挈领，毫无疑问对我们正确观察、分析本世纪初前 10 年国际环境，有很大帮助。

陆忠伟的《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和谏取荣的《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虽然都写于 2000 年，但是由于作者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所掌握的全面而丰富的资料作客观分析，因

此得出的科学结论，至今对我们认识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仍然十分有益。

陆文认为，在“告别”冷战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发现上一个世纪最后几年的两场“战争”——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国际投资对亚洲发动的金融战争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高科技信息战，揭示 21 世纪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的新内涵，即不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军事领域，战争手段在向专业化、知识化和信息化发展，工业时代的武器无法打赢信息时代的战争；工业时代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也无法与高科技结构相抗衡。作者尖锐地提出了：“高科技与金融现代化将是一个国家跨世纪的两轮”和“一个政治大国必须是经济大国；一个经济大国必须是金融大国、科技大国”的观点。与此同时，陆文还指出，从“文明冲突论”到“第三条道路”，从“主权有限论”到“新干涉主义”，从“北约新战略概念”的出台到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的定调，都标志着西方国家已初步为 21 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建立了一套理论。作者进而指出：这一切，无非“是以人权、人道、人性、人的安全为包装，为发达国家武装干预别国内政或攻击弱国经济”寻找的借口。根据这些观点作者得出结论：21 世纪国际关系将是复杂的，国际斗争将是尖锐的；国际社会仍然处在一个“冷和平”、高风险的安全环境之中，尽管安全形势是相对缓和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和平红利”仍未到手，人类还远未告别“冷战”。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战略力量对比与大国兴衰和国际经济与“超”“强”角逐。文中不乏鞭辟入里之见。

谏文认为，20 世纪这一百年中，围绕秩序问题的斗争从未停歇。冷战秩序崩溃后，特别是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口号，其后还提出有关原则和由它当“领导”的要求。从此，美国通过“超越遏制”、“参与和扩展”等战略的

实施，全方位地展开了谋求建立由它主宰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新秩序”的努力。政治上，美国利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和第三世界整体合力明显下降之机，在世界各地推行和巩固西式民主化；经济上，它利用世界市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强行推广经济自由化，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美国发展模式的扩张；军事安全上，它以冷战军事同盟关系为基本框架，构筑全球安全体系。文化上，它利用手中掌握的高新信息技术和西方新闻媒体，四处推销西方价值观念和美式“文化快餐”。上个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就是美国和西方一些大国不惜采取战争方式确立世界新秩序的一次重大尝试。在详尽分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所进行的斗争后，作者指出，面对美国等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攻势，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无动于衷。它们承认北强南弱，西强东弱，但它们懂得建立一种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现实的斗争将是难以回避的。它们相互理解各自不同的处境，但同时也切身体会到，通过地区合作、跨地区协调和全球性磋商，是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作者爱憎分明，既有强烈的正义感，又能用冷静、科学的头脑，为人们理清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过程中的是非曲直。

王在邦的《对世界格局转换与调整责任的思考》一文指出：当前，“如何看待世界格局向多极方向发展以及由此涉及的调整责任，已成为不可回避的课题”。他认为：1. 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当今主要发达国家总体上仍将位居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前列”，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技术产品的成本与价格将呈现下降的趋势”，“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某种局部‘后发效应’，出现更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是可能的；2. “未来10—20年，冷战后世界力量对比不平衡加剧的趋势可望有所缓解”；3. “在未来世界力量对比呈现出相对均衡

变化的情况下，包括欧日在内的美国以外其他主要大国在推行其自身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的过程中，可能表现出更多的自信，美国继续以其既有的霸权心态和行为方式谋求‘领导世界’，恐怕会难上加难”；4. “未来世界力量对比呈现出相对均衡化的趋势”，然而“未来世界格局稳定而有序转换所需要承担的调整责任主要还在美国”。

林利民的《关于中国 21 世纪初对外战略的几点思考》一文认为，1. 当前，对中国而言，发展具有双重性，即既是战略目标，也是战略手段。因此不但要发展，而且在 21 世纪初要保持 6%—8% 的年均增长率。2. 要以积极姿态全面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造，现存国际体系是苏美冷战及雅尔塔体制的附属物，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改造这一体系是大势所趋。改造这一体系时，不应谋求即时性的绝对利益，不应追求绝对安全和赢“满贯”，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该妥协时就妥协。3. 要选择全方位外交：重点处理好中美关系，扩大与美国的合作面，限制竞争面；发展与日、俄、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以发展中国家为战略依托带之一。4. 除了加强硬国力之外，必须注意加强软国力，如作为我国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坚持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取得的成功及这一切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5. 鉴于以大国为极的多极化前景可能被以区域板块即美洲、欧洲、俄罗斯和亚洲四板块为极的多极化前景所替代，中国推行睦邻外交将有利于联结亚太板块，为新形式多极化的来临作准备。

第一编还收录了三篇侧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文章。其中郭学堂的《集体安全与权力均势》和门洪华的《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郭文认为：从历史的经验看，每当国际政治体系发生变化时，尤其是在发生世界大战的情况下，集体安全思想就会兴起，

权力均势的影响就会削弱。在新的体系建立和稳定以后，权力均势思想和政策又会主导国际政治舞台。冷战结束后，人们一度重新对联合国解决国际争端的能力寄予厚望，但随后权力均势对其作用的限制也在加强。20 世纪的国际政治发展史是集体安全和权力均势两种体系并存、相互较量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了解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认识当今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和演变是很有帮助的。

门文的主要观点是：世纪之交，国际机制的作用增强是一个突出的国际现象。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有赖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互动，其中国际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作者想通过对国际机制与国际战略之间逻辑关系的论述，确立分析中国国际战略选择的一个基本理论框架；通过从历史角度分析中国与国际机制关系的历程，确立中国战略选择的基本模式；作者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具体论述了对中国战略选择的设计及谋划。

王学玉的《认识当前国际关系的不同理论视角》介绍了西方常见的五种国际关系理论。1. 现实主义。这种理论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永恒的冲突，冲突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主流。2. 自由主义。该理论确信，由于发展，使近半个世纪来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和平的相互作用关系已经确立，这是当前国际关系本质特征。3. 新制度主义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角，只有在国家有合作意愿时，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制度才能够成为维持和深化为国际合作的保证。4. 世界体系论认为，所有的国际关系问题都发生在一个形成、决定和限制这些事务的、根据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组织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全球经济体系加剧了世界的分化。5. 构建主义。这种理论强调认知、观念、社会话语等非物质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国家之间在主观想象方面的额定因素是影响国际关系的基本动力。文章还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

本书第二编辑录的 10 篇论文，分别论述了世界经济、世界军事态势、信息技术、有组织犯罪发展趋势、邪教危害、“人权”、“人道主义干预”、“人才安全”和民族等问题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宿景祥的《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经济格局》和陈凤英的《对经济全球化的几点思考》都是 2001 年以来研究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关系的论文。

宿文认为，1. 现代世界体系采取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式，也就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由资本的无限积累的冲动所支配的形式。2. 1917 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世界经济增添了新的内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形成了战后国际政治中诸多矛盾的交汇点，这是战后世界经济最基本的特点之一；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另一个深刻变化，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但是原殖民地各民族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如果不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实现经济发展，那么独立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3.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经济展现出一系列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即全球化、信息革命、世界经济体系中新的分裂和变化。无论是发达、发展中还是转形经济国家，都越来越依赖于世界经济，因此全球化反映了冷战结束所带来的时代性转变。冷战结束前，世界是按意识形态划分的，而当前的世界往往由技术来划分，重要的制度变革和技术变革，往往导致世界经济体系内部力量结构的变化。过去十多年世界经济中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是这一体系内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等级化结构。最后，宿文指出，世界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各国经济利益的全球化。21 世纪国家间利益冲突将是复杂的、长期的。

陈文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谋求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已经成为各国发展经济与进行国际合作战略目标，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选择。此外，商品、资金、技术、人员有可能在区域或世界范围内得以更自由、更大规模地流动。正是这一切使经济全球化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在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终于形成了以生产国际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当前国际经济关系中不可避免的现实。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充当着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角色。不过从长远看，市场经济不等于美国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全球化正在由单极加速向多极主导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亦将赋予全球化服务于全人类的新内涵。作者还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机遇，但绝不是“免费午餐”，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借助外国资金与市场，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用，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首选目标，也是关系到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大战略。

杨明杰的《21世纪军事形势基本走向》为我们清晰地勾画出本世纪初世界主要军事力量的对峙态势。他认为：世界主要军事力量正进入新一轮的军事扩张期；全球军事战略格局的不平衡态势有进一步加剧的危险；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and 考验。他指出，1. 全球军费开支出现回升势头，有关国家的军事实力将有不同程度质的飞跃。由于这一轮新的军备增长，是有关各国在总结冷战后世界军事革命和本国军事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且新技术的广泛运用、武器系统的更新换代、武装力量结构的调整，使军备增长对各国乃至世界军事实力体系的深远影响将在未来的军事实践中逐渐展现出来。2. 主要军事力量的军事战略与作战方针将有较大调整，战略威慑的内涵与外延都在发生深刻变化。3. 军事行动的空间将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五维化”，网络和太空正在成为 21 世纪国际军事竞争的新领域。4. 作为国际关系体系中的重要因素，军事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必将对 21 世纪国际安全形势的总态势产生深远影响。

俞晓秋的《对信息技术与国家安全若干问题的思考》认为：
1.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三个时代，即知识经济时代，亦可称为信息时代，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科学技术通过信息网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得巨大发展，并正在深入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现代国际关系。科技实力已经真正成为影响国际格局力量对比的“关键性要素”。某些前沿学科的突破性发展，决定着国家战略的调整和制定。科技发展对外交决策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科技的新发展正在促发一场新的军事革命。
2. “软国力”问题，即“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与无形权力资源，如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领域的力量”将会日益突出。
3. 国家安全面临“瞬间威胁”的挑战。
4. 鉴于信息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国家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因此，信息安全已经成为当前国家安全中的突出问题。信息网络的发展，使冷战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这将是利用互联网为主要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一场长期斗争，新闻传播、政治理念、文化价值观将成为这场斗争的主要内容。这场斗争的成败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李伟的《国际有组织犯罪发展趋势》是研究当前国际黑社会问题的论文。

李伟认为，过去十年国际有组织犯罪，即黑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发展大体都经过三个阶段，即“黑色经济”的“原始积累”阶段、“扩张期”和“成熟期”。当前，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发展迅速，以俄罗斯为例，截止 1999 年，此类犯罪团伙增至 8000 多个，其中 200 个已发展成典型的黑社会组

织，其犯罪活动扩展到美国等国家，它们控制了大量银行、商业、合资企业，犯罪所得占俄 GDP 的 40%。犯罪集团的区域性合作也在加强。例如，俄、意黑手党建立的“地中海战略基地”与哥伦比亚毒品集团相勾结，在加勒比海建立走私、贩毒和贩卖军火的新基地。研究认为，从有组织犯罪活动特点看，今后发展趋势是：1. 借助黑色资金优势，充分利用先进科技从事犯罪活动；2. 黑金政治仍将是犯罪集团赖以生存的主要手段。国际反黑斗争的措施主要有三方面：（1）各国逐步完善反黑立法。（2）国家情报机构介入反黑斗争。（3）加强反黑斗争的国际合作。

欧阳柏青的《当前世界邪教的特征、危害及应对措施》是研究当前世界邪教问题的论文。

欧阳认为，邪教通常以犯罪群体的形式出现，从事危害社会的种种犯罪活动。全世界目前有邪教组织 1 万个左右，信徒 1 亿以上，遍及多数国家。当代邪教有三种基本原型：伪基督教型邪教；迷信—会道门型邪教；健身—“特异功能”型邪教。在我国健身—“特异功能”型邪教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如法轮功。邪教往往以编造、散播世界末日论为核心的歪理邪说，制造思想混乱，腐蚀政权根基；邪教多建立秘密帮会式组织，从事犯罪活动，破坏社会政治稳定，有的邪教组织干政色彩相当浓厚，妄图建立祭政合一的极权体制；邪教都不择手段聚敛钱财，破坏社会生产及财政金融秩序，威胁国家经济安全；邪教活动日趋国际化，成为有的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世界各国对邪教都采取严厉打击、遏制其生存发展的措施。如：坚决打击对社会危害极大的邪教组织，严惩其头目和骨干；以法律为武器，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和新立法为进一步打击邪教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建立常设机构，加强对邪教活动的研究、监控和防范；动员社会舆论揭露其危害，增强国民对邪教的免疫力，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抵制邪教的蔓延；加强反邪教的国际合作。